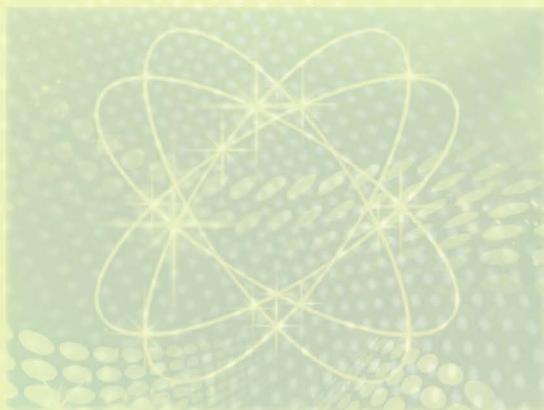


周恩来与当代中国



目 录

- 001 / 功过又如何?
- 003 / 不是帅才?
- 012 / 对香港的挽救
- 022 / 奠定大格局
- 045 / 与斯大林周旋
- 053 / “一边倒”和“另起炉灶”
- 061 / 赫鲁晓夫及其他
- 081 / 和英美握手
- 092 / 冒险
- 100 / 周边的运筹
- 115 / 外交成就最显赫
- 122 / 走下圣坛
- 135 / 林彪不是那样的人
- 143 / 评《水浒》，抓“伍豪”
- 154 / 殚精竭虑 苦心安排
- 170 / 六个办公室

- 189 / 艰苦朴素是真
218 / 朋友们
232 / 最后一杯酒
246 / 从周郎到周公的诗人性格
257 / 江南一叶 千古一剑

功过又如何？

我在北京的日子，常常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议论周恩来。以往，周恩来不是不可议论，而是没有什么分歧的意见，赞声几乎是一致的。近些年有些不同了，渐渐有人提出疑问：他逢君之恶、助纣为虐？还是被迫违心、相忍为国？从这个意义来看，是不是要对周恩来另眼相看了，他是古今第一贤相，还是古今第一佞臣？

周恩来受到的大尊敬之下，也有暗流。但只是议论纷纷，没有人提出完整的意见，肯定周恩来那些方面有功，那些方面有错，功过相比又如何？我接触到的情况往往是浅尝辄止，没有深入交谈，更谈不到交锋，似乎带点神秘的样子说，有人在议论周恩来了，说他不是那么好。

庐山会议是一个焦点。有人指出，周恩来没有支持彭德怀，相反的，却是在支持毛泽东，打击了彭德怀。而他不但应支持彭，本身就应该做彭德怀。那样一来两个彭德怀加在一起，力量就大了，毛泽东就不见得那么轻易能和这股力量压下去了。一加一减，此消彼长，毛泽东没有周恩来的支持，力量是要减弱的，批评他的力量却增强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形势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更大的焦点。首先，周恩来没有支持刘少

奇。相反的，他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，他是积极在毛泽东的指点下去整刘少奇。在刘少奇的问题上，他似乎没有作过抗拒或斗争。

倒是对于贺龙，他是保护的，只是以他的力量，也还保护不了。对于陈毅，也有保护，却也连一个外交部都一度被夺权。还有别的许多人，有保护，也有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。不过，这一点是许多人都承认的，如果没有他的保护，许多人就更加不堪设想了。在这上面，无论如何，他是有功的。

而在邓小平身上，他更尽最大的力量，使毛泽东同意在危难之际，起用这个“人材”，重整河山，恢复元气。没有周恩来，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的东山再起。

不是帅才？

长时期追随周恩来的何树英，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论断：周恩来不是帅才。还说周恩来自己对人也说过“我不是帅才。”

在中共中央担任过军委主席，尽管是早年，这样的人不是帅才么？在解放军已经发展到数以百万计时，担任过总参谋长的人，能不是帅才么？在一个成十亿人的国家，长期担任总理的人，能不是帅才么？

何树英说出了一个小秘密。毛泽东曾经在苏联当着赫鲁晓夫面前，一个一个数说他的接班人，这当中固然没有提到林彪，但对周恩来，也是只把他排在第三个的位置上。“第一个是刘少奇……无论能力、经验还是声望，都完全具备条件了。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，原则性很强，弱点是灵活性不够。”天知道他是说真话还是假话，真也好，假也好，反正这个第一号不久以后就成了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要横扫的牛鬼蛇神的第一号。

第二个呢？人们都以为是周恩来了，谁知不是。“第二个是邓小平。这个人政治性强，思圆行方，既有原则性，又有高度的灵活性。柔中有刚，绵里藏针。很有发展前途。”这和“文革”中重新起用他时夸他的是一样的。但这个第二号，在“文革”一开始时，也是要横扫的第二号。

毛泽东这样搬了一个指头又一个指头，搬到第三个指头时才说“第三个是周恩来。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，但是周恩来政治上有弱点……”

不过，接下去，毛泽东总算说了“但他是个好人”。在他眼中，周恩来只是“一个好人”而已。

对面的赫鲁晓夫也来了一句“但他是个好人”，他的“好人”的帽子是戴在米高扬头上的。赫鲁晓夫说“我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（总理）的职务。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，拿掉谁他都难过……但他是个好人。”他停了一下，再加上一句“不过大家还是由我来管全局。”

毛泽东不理他，只顾继续搬自己的第四个指头说“朱德同志年龄大了，他德高望重，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。”

这以后，就传出了周恩来自己说“我不是帅才”的话。据说在一次会议分配某一项工作时，毛泽东望住周恩来说“恩来同志，你来怎么样？”周恩来推辞说“不行、不行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不是帅才。我理理家可以，作不了帅……”邓小平接下去也说“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，不是帅才！”

我实在有些怀疑这些谈话。周恩来还可能如此自谦，邓小平会如此坦率？会直指周恩来不是帅才么？

我怀疑这是某些人今天制造出来的言论。

因为还有一个传说，说周恩来一次和薄一波谈话，突然问薄一波“你在晋冀鲁豫和伯承、小平共事多年，你对他们两位的工作怎么看？”薄一波回答是两人配合得很好。周恩来说他不是问这个，问的是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，薄一波推来推去

不肯说，最后还是周恩来说了：“我多年观察，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。小平同时是‘举重若轻’，伯承同志是‘举轻若重’。”

薄一波连连点头，周恩来却只顾说下去：“从愿望上说，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‘举重若轻’，但说实在的，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，我和伯承同志一样，在工作上常常是‘举轻若重’……”

周恩来自己的确是事必躬亲，管得很细，管得很具体的。经常保持一天只睡一两小时，有时甚至一两天都不睡觉。秘书们看到，劝他少管一些，休息一下，他偶然还要生气。有一次秘书劝他把公事交给副总理邓小平去看，他却说：“我是总理。这些事我多干一些，让他去管更大的事，多想些决策上的事。”

这像是一个总理说的话么？简直像邓小平才是总理，他只是副总理。

毛泽东在赫鲁晓夫面前，那样说周恩来，恐怕有故意贬低他的意思。他是不是真的把邓排在“数二”的地位时，“数一”的是刘少奇，这个“数一数二”是数箭靶子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借他们来祭旗而已。要打的时候，他们是“数一数二”，要接的时候，接班人却是林彪。

周恩来处事精细、谨严，但并不是不会从大处着眼，大处落墨，要不，又怎能挑得起几亿甚至近十亿人口国家的大担子？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自己“不是帅才”，一方面是谦虚，一方面也可能是免遭猜忌。你总不能当面把毛泽东捧为皇帝，他只能是帅，他既是帅，你还能自夸是“帅才”么？

其实，这里说“帅”，只是第一把手的意思。和一般的“帅”意思不尽相同。古代有皇帝，第一把手就是皇帝，帅只是

军中的第一把手。拿诸葛亮来说，在蜀国，阿斗是第一把手，诸葛亮是第二把手，但诸葛亮却是帅，不是君，君才是第一把手。

现在毛泽东是主席，是第一把手，指挥几百万大军作战时，他是军委主席，是帅。但各路野战军的统帅，是不是帅呢？当然也是，到后来，到了五十年代里，不是都封了元帅么？难道没有封元帅的就都不是“帅才”？要说不是，毛泽东就不是，他也没有封帅。周恩来也不是，邓小平也不是，他们两人难道也都没有“帅才”。他们都是指挥过超过一个野战军的人，比帅更帅了。

我不认为，周恩来不是“帅才”，无论从军事，从政治，从外交上看。特别是外交，他的“帅才”可以说在这三方面中最“帅”的，而在举世的外交队伍中，也可以说是一时无两的“帅才”了，更不用说雄视苏联、东欧，也就更不用说雄视中国自己的外交队伍。

尽管周恩来自我评价，说他处事“举轻若重”，不是“举重若轻”。尽管有人说邓小平刚好相反，能“举重若轻”，这才是“帅才”。我依然认为周恩来是“帅才”。

有人这样描述周恩来的“举轻若重”，有些事是司、局长却不屑一顾的，周恩来却乐于大管那些琐事、小事，而且管得仔细、认真。毛泽东听到了也不禁赞他“连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。”

尼克松也说“周恩来也是有另一种本事：他对琐事非常关注……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，应邀去看体育馆乒乓表演。当时天已经下雪，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长城。周恩来离开了一会，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亲自去关照

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。第二天，路上洁净得如同没有下过雪似的。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。”不过，这个例子也使人另有所感，是有些劳民了。当然，不劳也不行，让初访中国的尼克松登上长城，充当一次“好汉”，也是必要的事。

尼克松又说“我还发现，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。这些士兵身体健康、魁梧，穿着整洁。周本人还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。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（事实上不是如此），因为他所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，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《美丽的阿美利加》。在结束这次旅行后，国务卿威廉·罗杰斯告诉我：有一次，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，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，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的大样请他过目。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安排的头版。”

这几件事已经是人们熟知的了。不过尼克松还加上他的看法“他对琐事非常关注，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。”又说“对于周恩来来说，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，但也能够看到森林。”也就是说，周恩来“举轻若重”，但并不是忽略了“重”，是一样注视，一样能“举重”。

当周恩来举重时，是显得“举重若轻”，还是“举重若重”呢？虽然显得劳苦，却不是“若重”，顶多是“举重若重”。但从他稳重踏实地一一对付当前任务，不也是潇潇洒洒地有“若轻”之状么？

有人说，每一个赞颂周恩来的人，一定会联想到诸葛亮，而不会想到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。又说，当毛泽东从陕北到四川，从延安到重庆时，感怀的也是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以至成

吉思汗，而周恩来在西安成都道上，却不是去看秦皇汉武遗迹，只是去看张良庙和武侯祠，这不是一件很可使人深思的事么？

我却认为，诸葛亮也好，成吉思汗也好，都是“帅”。唐太宗、宋高祖也都是由“帅”而帝的。周恩来当然不是“帝”，他不作第一人想，但也绝不是“非帅才”。

周恩来表现出来的并非“非帅才”，不但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，是毛泽东的总参谋长，也在抗美援朝外战时期，是实际上的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。当时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，固然是彭德怀，是挂帅字旗的，但还有毛泽东，坐在北京城，运筹帷幄，起了最高统帅的招牌作用。周恩来的“总参谋长”是这位高高在上者的助手，也是挂帅字旗的人物。尽管有毛泽东在起作用，你不能说彭德怀、周恩来都不是“帅才”。

毛泽东既是“君”又是“帅”，周恩来就是“帅”不是“君”。有些非议周恩来的人，指责周恩来，最大的弱点就是太“忠君”了，太顺从毛泽东了。

长期在周恩来左右工作过的人，有人认为：“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，谦和恭敬有余，真言敢谏，坚持原则稍嫌不足；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，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；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，也做出让步，违心地属从了。比如‘文革’后期，他发现了问题，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，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。”这就是有些人指责的“逢君之恶”。

不过，邓小平却是这样看的，他曾经表示过：“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，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。他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没有倒下是件极大的幸事。当时，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，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。但人民原谅他。因

为他不做这些事，不说这些话，他自己也保不住，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，起减少损失的作用。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。”

当年重庆谈判时，周恩来为了保护毛泽东，在各方面都亲自尽心尽力去做。他特别指示，不让毛泽东吃独食，大家吃什么，就吃什么，这就可以避免有人下毒，饭菜如此，喝酒就更是点滴都不让毛泽东进口，他的卫士何树英说，宴会上凡是有人敬酒，“不论敬来多少，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……那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，天天喝大酒，喝得轰轰烈烈，惊心动魄，却没有一次醉，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，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，好几个人都哭了，那是真正卖命来保卫毛泽东啊！就是怕酒里有毒。”

何树英又说“当时我也流了泪，近三十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，就是江青搞‘批周公’……毛泽东当年在重庆，她也在，她自己说过‘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，我们谁也比不了’。可她现在居然‘批周公’！我曾问一位老同志，‘主席讲话了没有？’老同志忧郁地摇摇头。于是，我难过得流下了泪……”

“批周公”的时候，毛泽东没有保护周恩来。“伍豪启事”旧案重提的时候，毛泽东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也没有立刻点破，不许胡闹，直到后来标志的原由。

至于生前，毛泽东只去过周恩来办公所在的西花厅一次。

而周恩来对毛泽东，却真是一片赤胆忠心，特别在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，最可以看得出来。

周恩来不仅仅是每有酒来，必替毛喝，宁愿以身代毛，也不让毛中毒，所有保卫工作，都是由他负总责。首先，贴身警卫就是他亲自挑选的。他说“要有龙虎之士”，他的一个卫士顺口说“毛主席是真龙，贴身的警卫当然也应该是龙。”周恩来

笑了，也说“应该是龙。我们就用三条龙。”结果果然选了陈龙、龙飞虎跟毛泽东，颜泰龙跟周恩来，而周恩来也是跟着毛泽东，几乎寸步不离的。

周恩来当时的卫士何树英说“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，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‘主席到了，再不要管我，你们都要全力以赴保卫毛主席！’”何树英还说“那段日子，周恩来实在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，衣食住行，样样亲自抓，亲自安排检查。毛泽东在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，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。”

周恩来是一里路一里路，一段一段地，安排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。

好不容易重庆谈判结束了。毛泽东就要回延安了。张治中为他举行酒会送行，酒会后又去看戏。正在看戏当中，有人向周恩来汇报出了事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李少石被行刺了。周恩来不动声色地离开，首先就判定这是一次政治暗杀，目标是毛和他，误杀了李少石。

他马上打电话给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张镇，要他立刻过来。而且向张镇几乎是下命令似地说“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，你必须坐他的车，亲自送他回去。”张镇立刻答应了。

周恩来赶去看李少石，李少石已经死了，他回到剧场，陪毛泽东看戏，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戏散了，张镇遵命亲自送毛泽东回住地，然后才向毛报告。

毛泽东在重庆期间，张镇对毛泽东的安全的确尽了努力。毛泽东回延安后，周恩来在重庆专门设宴，款待张镇，敬酒说：“共产党不会忘了你的！”大陆解放后，他又多次交代罗青长和童小鹏“将来台湾解放，对张镇在重庆谈判这一段的功劳，一

定不要忘记。”

周恩来不但念念不忘张镇，也没有忘记张镇的部下。毛泽东回延安后，他连声交代 “请客，请客，把为毛主席服务过的宪兵和别的人员一起请来！”

对香港的挽救

十年“文革”中我没有在大陆上生活过，没有机会“躬逢其盛”，对那些史无前例的情景没有亲身经历。只是听说，周恩来曾经东飞西走，到处去劝导红卫兵，不要作出太过份的行动，这样的劝说工作往往在夜间进行，听两派辩说，再加以劝导，常常是从午夜直到天明。红卫兵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周恩来却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，只是这一点，已是苦了他。

有一件事我是愿意不厌其重复，再说一遍的，就是他阻止十年浩劫的大灾难向香港发展。这是香港一般人并不知道，香港一般左派也并不注意到的一件非国家机密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在大陆上全面展开，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之际，北京就对香港的左派下达了命令：香港不搞“四大”，不搞“文革”。香港左派的任务只是宣传“文革”，学习、宣传毛泽东思想。所谓“四大”，就是大鸣大放、大辩论、大字报、大串连……这些都不搞，也就是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扩散到香港来，它只到深圳河边就停住了。

左派的任务只是学习、宣传。宣传的结果，就是在“左报”的要闻版上，天天就只是一条新闻——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除此以外，就并没有什么国内的重要新闻了。

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就是版面上“破四旧”，扫荡那些被认为是“封资修”的东西，这就是副刊上面的小说和别篇文章，这就是马经和狗经。在左派圈内的人，家庭中也有影响所及，自“破四旧”的。有些人交出了字画，这是封建主义？别人停用雪柜，不看电视，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……保留电视机只看新闻行不行？那可能受到批评。至于左派以外的报纸，平日不一定都被认为是反动报纸，这时都一下子又“反动”了，至少在公开的场合不能看了。左派电影公司这时最为难，什么戏也不能拍。古代题材，封建，现代题材，资本主义。还有什么好拍呢？一部《屈原》，改过来，改过去，一时要把屈原拍成法家，一时又拿他不准。导演实在是无所适从。

这一切，只是限于在左派圈子中，兴起一些不太大的风浪，并没有在香港社会扩散开来，一般人并不一定知道这些暗流。

他们领教到的只是“五月风暴”掀起的“反英抗暴”的横流，而受到震撼，感到惊恐。

许多人不知道，这时在新华分社里正酝酿着一股暗流，要求把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式搬到香港。大字报已经贴出来了，要逼着当时的领导梁威林、祁烽表态。他们并非不“左”，只是上边的指示是分明的，毫不含糊的；香港不搞“文革”。搞呢？还是不搞呢？这就是问题。

正当梁威林、祁烽感到不好办时，周恩来传令来了，要新华社里帖大字报的“革命小将”到北京去。他长谈了七小时，从形势谈到政策，强调香港不搞“文革”，海外不搞“文革”是中央的决策，不能擅自行动，打乱了中央的部署。所谓海外，除了香港，还有澳门。除了港、澳，还有派驻各国的使馆。在使馆中，也有人主张关起门来，自搞“文革”的。有没有这样

搞起来了的使馆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有些使馆的工作人员，被召回北京批斗。像当时驻巴基斯坦的大使章文晋，一到北京机场，就有等在那里的红卫兵把他揪走了，成为第一个受冲击的大使。还有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、香港比较熟悉的司马文森，也是从巴黎被召回北京，结果被斗得病发而死的，有人一下飞机，就被罚下跪，在机场上就斗了起来。这也是“文革”余波波及海外的结果。

周恩来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导，终于制止了香港新华社“革命小将”要把“文革”的火种在港澳点燃的企图。不再贴内斗的大字报，一心一意，去贴港英的大字报，外斗英国殖民主义者去了，这就是后来闹翻了整个港九——一九六七年“五月风暴”的“反英抗暴”斗争。到底是“文革”未遂在前，还是“五月风暴”在前，我不很清楚，后来也一直没有向当事人那些“革命小将”去打听，他们今天也已是退休人员，年华老大了。我推想，应该是“文革”未遂在前，大约是一九六六年，“五月风暴”在后，六七年，时间上比较对。一九六六年是“文革”初起之年，香港的“革命小将”不会在一年以后才起而响应那么迟钝。

不能搞“文革”，满身“革命”的劲往何处使呢？既不内斗自己，那就外斗港英，这是一个逻辑上很为合理的发展。而港澳的领导，梁威林、祁烽，在一九六六年领导澳门左派斗败了澳葡，使它低头以后，由新华社的群众情绪，考虑到港澳的群众情绪，澳门的群众已经斗了一场，斗得很过瘾，香港的群众也正在斗志昂扬，不能引火烧身，搞“文革”，斗自己，那就顺理成章地，想到了不如去斗港英，“反英抗暴”。“五月风暴”因此产生，这也是一个很为合理的发展。在时间上，它就必须